



山东金融业联合会
SHANDONG FINANCIAL ASSOCIATION

山东金融信息简报

2022 年 08 月 12 日 总第 541 期

每日重点关注

人民银行发布 2022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需稳固，结构性通胀压力可能加大。但总的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人民银行将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提振信心。

地址：山东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 42-1 号山东天舜大厦 502 室

电话：0531-82096958

邮箱：sdjrylhh@163.com

官方网站：www.sd-fa.org.cn



资讯动态

★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发布《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发展报告（2022）》。截至 2021 年末，保险公司股权投资（包括未上市企业股权、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计划，不含境外股权投资数据）规模为 1.71 万亿元，占总投资资产的比重为 7.88%，仅次于债券、金融产品、银行存款，为保险资金的第四大资产配置类别。

★ 中证协公布上半年证券公司承销绿色债券数据。上半年，证券公司共承销（或管理）绿色公司债或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合计金额 906.17 亿元，承销创新创业公司债券金额 407.73 亿元；承销（或管理）民营企业公司债（或产品）金额 638.34 亿元。

★ 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申报工作的通知。围绕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聚焦“数字领航”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方向，遴选一批试点示范项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 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技术）目录的通知。要加快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参考产品（技术）推广应用，鼓励引导工

业企业改善电能质量，加强用电设备改造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用能效率和需求响应能力，为促进工业领域能源消费革命发挥积极作用。

★ 中汽协：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5.5万辆和242万辆，环比分别下降1.8%和3.3%，同比分别增长31.5%和29.7%。当月产销量虽然低于上月，但为历年同期最高值，总体判断目前行业发展的态势良好，并有望继续延续；1-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57.1万辆和1447.7万辆，产量同比增长0.8%，销量同比下降2%。上年8月行业受芯片短缺影响严重，产销量水平较低，因此今年1-8月有望实现产销双增长。

★ 截至8月10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8183.7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4.1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7079.7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7.48亿元；两市合计15263.4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1.61亿元。

★ 今年以来新三板摘牌企业达174家。8月1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欧克新材、ST红连、中恒安、大生泰丰股票终止挂牌的公告。据了解，上述4家公司都是因为自行提交终止股票挂牌的申请而将于8月12日起终止股票挂牌。今年以来，终止挂牌的新三板公司家数已达174家。与此同时，新三板挂牌企业数也持续增加，截至8月8日，2022年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115家，累

计挂牌企业家数 13489 家，剔除已退市企业现有存量 6723 家。有业内专家认为，新三板“强制摘牌”的持续推进，正形成企业能进能退、投资风险与投资者适当性匹配的良性市场生态。

◆ 截至 7 月底，山东省民政系统共摸底排查 20063 家养老服务机构和场所。核查 1038 条转交举报线索，将 32 家养老服务机构、场所及关联企业列入“红橙黄”风险管控名单，督促 6 家机构清退预收费资金 968.4 万元，各地上报 59 个问题隐患全部完成整治。

◆ 前 7 个月，山东机电产品出口 4759.6 亿元，增长 21.7%，占出口总值的 41.6%，继续延续今年以来出口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其中，汽车零配件出口 708.7 亿元，增长 18.6%；电工器材出口 294.7 亿元，增长 44.7%；电子元件出口 278.8 亿元，增长 42.4%。

会员动态

鲁信集团:深耕公益慈善，践行国企担当

作为省属重要骨干金融企业，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全力推进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号召，以山东省鲁信公益基金会为平台，先后开展公益捐赠和志愿服务活动 200 余次，累计自筹并协调争取社会各类帮扶资金近亿元，在助力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展现了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连续两年获评“山东社会责任企业”称号。

在 8 月 5 日召开的山东省属国资国企社会责任报告集中发布活动上，鲁信集团介绍了深耕公益慈善方面的经验。

据了解，鲁信公益基金会成立于 2017 年 7 月，由鲁信集团及其权属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原始基金规模 2800 万元，是经山东省民政厅认定的 AAA 级社会组织。基金会倡导“爱心·感恩·责任”的理念，坚持聚焦扶贫、济困、敬老、救孤、助学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结合自身业务优势开展各类公益慈善活动，让有限的帮扶资金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

多措并举深入帮扶 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鲁信公益基金会积极支持省派“第一书记”在曹县的帮扶工作，每年向“第一书记”帮包村捐赠专项资金，支持帮包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改善、乡村文明建设，帮助

当地发展特色产业。

为了让帮包村学生安心学习，鲁信公益基金会为鲁信集团 9 个帮包村设立了 150 万元的奖学金，作为公益信托并长期存续，近五年共发放奖学金 125.2 万元，460 余名学生受益。

每年春节、儿童节等时间节点，鲁信公益基金会还组织员工赴曹县开展送温暖、爱心助学、文化下乡等活动；联合千佛山医院、曹县人民医院、省康复医院开展多次义诊活动。此外，基金会还面向无棣县、临朐县等地开展公益志愿活动，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立足自身业务优势 长效发力多方共赢

立足旗下山东国信信托业务优势，鲁信集团先后设立多单慈善信托，形成了金融助力公益慈善事业的长效机制。

其中，2018 年初，由鲁信公益基金会作为管理人、省国资委发起设立的“国资惠农·慈善信托”项目，总规模 2000 万元，是 2016 年《慈善法》实施以来我省成立的首单国资背景慈善信托，每年有 150 余万元的稳定收益，用于增加巨野县经济薄弱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后期还将根据省国资委安排继续加大力度支持乡村振兴事业。

立足旗下鲁信天一印务作为全国医药包装印刷行业领军企业的优势，与山东技师学院、山东工业技师学院合作办学，连续五年设立“鲁信天一班”，让 130 余名学生实现毕

业即就业，帮助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

精准发力解决困难 投身青少年教育事业

鲁信公益基金会长期关注青少年发展，在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财经大学设立了“鲁信奖学金”，还为“第一书记”帮包村设立了励志奖学金。

2021年，在得知济南民政在解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方面面临经费不足的困难后，专门支援救助资金42万元，全部定向用于济南市辖区内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年满18周岁、正在进行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针对济南市南山区部分学校存在的教学困难，经过认真考察调研确定帮扶方案，鲁信公益基金会共向8所中小学捐赠价值25万元的文体教学设备和采暖设施，为部分学校配齐建强音乐教室和多媒体教室，提高了公益帮扶的精准度。

此外，基金会从2019年起连续四年联合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央美·鲁信”全国少年儿童绘画大赛暨优秀作品展，前三届累计收到作品5万余幅。通过与国家级院校合作，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推动了全国青少年美育和少儿美术事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组建“鲁信义工”团队 树立担当责任形象

鲁信义工团队是依托鲁信公益基金会平台、由鲁信集团青年员工自发组建的志愿团队，现有成员400多人。他们热

心公益、无私奉献，面向济南市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星神特殊儿童关爱中心、颐乐老年公寓以及济南交警、环卫工人等机构或群体多次开展爱心捐赠和志愿服务活动，向国家残疾人乒乓球训练基地进行定向捐赠，多次组织爱心助学、义务植树等活动。

“鲁信义工”已成为青年员工奉献爱心、展现自我、实现成长的平台，成为鲁信集团的亮丽名片。鲁信公益基金会还主动对接省血液中心，近年来先后组织鲁信员工 500 余人次累计献血 14 万多毫升。

2021 年岁末，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西安，防疫一线 N95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紧缺，鲁信公益基金会紧急向西安捐赠了价值 10 万元的防疫物资。针对近期菏泽疫情，基金会于 8 月 4 日向菏泽市牡丹区和曹县紧急捐助 20 万元的防护服、N95 口罩等防疫物资，助力疫情防控。

鲁信公益志愿活动得到社会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擦亮了省属国资国企的品牌形象。鲁信集团将继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新工作思路，对接更多社会资源，将公益慈善事业发扬光大。

名家观点

建设统一大市场，财政体制设计需要新思路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刘尚希）

区域问题实际是个空间问题。区域财政和区域经济，都涉及到区域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形态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产业和人口的聚集，经济、社会的空间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区域财政也随之变化，财政的区域分化日渐明显，财政体制面临着经济社会空间形态变化带来的挑战。

财政学里很少涉及到空间维度，一般都是在假设空间是均质的条件下来考虑财政问题，以此为前提来设计财政体制。但从现实来看，经济社会空间不是均质的，而且在进一步分化。我国在 1994 年推出分税制改革方案时，当时提出的基本原则“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其潜在的假设条件就是经济社会空间的均质性。只有在空间均质的情况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才能成立。

由于潜在假设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故而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在实施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更改了这个原则，改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从这点来看，我们从空间的维度来探讨财政体制的改革，在新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紧迫的，这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

场的建设无法绕开的问题。

多元目标下如何实现激励相容

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来看，当前面临着多元目标下实现激励相容的问题。这与央地关系直接关联，其中的核心问题或基础性体制是财政体制。统一大市场是区域之间的横向分工与协作的问题，而其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却与纵向制度安排有直接关系。在纵向的制度安排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处于核心地位。

大家知道，在过去发展的阶段，我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GDP 的发展成为单一维度的目标。当时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就很简单，也很直观。而现在我们到了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的目标变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改革；发展的目标也从过去追求经济高速度变成了追求发展高质量，从一维的“增长”转向多维的“发展”。改革的目标、发展的目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说由过去的单一目标变成了多元目标。在这种目标多元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怎么样进行激励，怎么样实现激励相容，这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单一目标下促进经济增长，做大 GDP 蛋糕，这种激励机制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到了新发展阶段，发展目标更为多元，不仅仅有 GDP 的增长，还涉及到社会的公平，其中也包括了区域的公平。低碳绿化、资源节约、遏制气候

变化等也成为重要的发展目标。由此，激励相容的复杂性成倍地增加。

此外，由于人口流动和家庭迁徙，公共服务成本的区域分摊日渐显现。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也日渐凸显。如此等等都成为财政体制中需要去考虑的重大问题。

在中央各部门针对地方设定的每一个考核目标都可能存在一票否决的情况下，地方的行为选择有时候就可能会陷入一种困境。这恐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十分复杂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在上升，这意味着辖区之间外溢性的问题在增多。辖区之间的外溢性既包括正的外溢性，也包括负的外溢性。这种正的外溢性带来的收益如何内部化？负的外溢性导致的成本如何内部化？毫无疑问，这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这离不开纵向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如果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能消除这种辖区间正的外溢性和负的外溢性，那么区域市场之间就很难统一，它会存在各种隐形壁垒。当前现实当中已经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问题。

所以，当前财政体制的设计需要新思路。过去是单一目标，现在是多元目标。多元目标怎么同时实现激励相容，这是财政体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动态社会公共服务成本的区域分摊

过去是一个静态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一个动态的社会。市场化、工业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城市化吸引了社会人口的流动和家庭的迁徙。人户分离成为当下的普遍现象，至今有 5.04 亿人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流动儿童、老人成为当下的常态。这给公共服务的提供如何实现“随人走”带来了极大挑战。还有空巢老人的照顾、留守儿童的抚育也成为公共服务要面对的问题。

青壮年劳动力打工在外地，医保、养老在户籍所在地，在人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的区域，公共服务的成本如何在区域之间分摊？一旦这种区域协商变得成本极高或不可能的情况下，就需要上一级的政府来解决和承担。这也就是后面要谈到的事权、支出责任要上移。

过去的财政标准收支以及转移支付，都是可以在假设人不流动的情况下去设计。而现在动态社会的来临，不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在流动，更重要的是家庭迁徙日渐扩大，人口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2.9 亿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其公共服务也在农村，在当地难以享受同城待遇。尽管一般性转移支付已经考虑到了常住人口因素，也有专项转移支付与农业人口市民化挂钩，但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在上学、养老、廉租房等方面依然难以享受平等待遇。所以，怎样转变到从动态社会角度去完善财政体制，事关城市化能否以人为核心、事关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本积累。

解决辖区间外溢性问题，需要事权、支出责任上移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辖区间外溢性问题不断增多。而外溢性问题的解决要靠区域之间去谈判，成本非常高。在久拖不决的这种情况下，区域效率、区域公平都将受损。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更高一级政府来解决，这意味着事权、支出责任要上移。

而从现实来看，恰恰是反向的，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是在提高，是在下降的，目前中央支出占比是14%多一点，地方支出比重越来越高，接近86%了。

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更多的事情交由地方，辖区外溢性问题就越难以解决，这导致区域之间的博弈趋于非良性发展，国家治理效能也难以提升。过去单一的目标下，区域之间是竞争的，竞争的目标是怎样做大蛋糕，这种竞争可能是良性的。而现在多元目标下，辖区之间的外溢性问题本来应该由上级解决，上级把这个事权压到地方，要地方自己解决，实际上形成多元目标之间、区域之间的博弈，带来了极高成本。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不但导致全国市场难以真正统一，区域间资源配置难以优化，而且各个地方也在强调所谓的产业链安全，以邻为壑的现象也不时出现，在疫情防控中这种现象时有发生。

由此看来，财政体制应当考虑，随着改革目标、发展目标多元化，事权、支出责任怎么上移。而这在地方还涉及到

一个风险责任和责任风险问题。随着宏观不确定性扩大和公共风险水平的上升，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不断提高，支出责任上移势在必行。这体现在中央的本级支出占比要上升，当前的这个占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历史最低点。

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体制需要进行调整优化，财政体制在这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它具有决定性作用，决定了治理效能的高低。可以说，财政改革其实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改革。对这个问题应该深化研究，仅仅在横向上、在地方找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横向问题、地方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在纵向体制安排上，可能在事权、支出责任层层下移上。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横向的问题实际上都难以解决。

地方政府的辖区财政责任，需要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

正因为事权上移，对地方财政体制又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区域财政与辖区责任的问题，或者辖区的财政责任问题。省作为区域政府，市作为城市政府，这两级政府对它辖区之内的财政能力的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负有责任，而从现实来看，辖区财政责任是不清晰的。

县乡财政出现困难，不是首先体现在辖区责任上，而是中央财政一杆子插到底。这导致财政责任缺少排序的规则，会淡化省市两级财政的责任，在信息不对称、成本高、效率低的条件下，易衍生风险。所以，完善地方财政体制，需要地方区域政府承担起区域财政的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的责

任，区域之间的横向平衡要依赖于这种纵向平衡去解决问题，两者是相关联的。从这点来看，地方的辖区财政责任实际上是区域财政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当然，在这里面有横向转移支付问题，也是需要中央纵向地去协调，比如省与省之间横向的转移支付（如对口支援、生态补偿等），没有中央的协调就很难实行。

我们研究过一些案例，比如跨省的上下游的生态补偿问题，两个省之间的谈判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类似于这样的区域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其实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制度性安排的，而现实的做法是一事一议，不可预期，在横向转移支付上没有构建制度性安排。

当然，广义的转移支付不仅仅是这种跨区域河流上下游之间涉及到的横向转移支付，还包括现在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各种各样的支援，比如对新疆、西藏、东北等地的常年对口支援以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的对口支援等等，这是我国的一种政治优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横向的转移支付，但没有体现到财政制度上，不如财政上比较规范的纵向转移支付那么显性化。

现在没有一个横向转移支付的统计，数据要统计出来才可以看到，这种横向之间资源的转移规模其实并不小，但不透明。怎样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到位。横向转移支付需要在制度上有更加明确的安排。实践中已经

有一些做法，也是在探索，在摸着石头过河，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没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在制度上也没有形成很清晰的制度路径。这就导致了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尤其在多元目标情况下，激励相容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

具体表现在行为上，地方不像以往那样有积极性了。单一目标下，地方很积极，在分税制财税体制下地方抓生产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非常高，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被解读为中国增长奇迹的密码。而在多元目标下，地方在选择组合上都存在不确定性，收益、风险难以预期的情况下，地方的选择组合偏向于零风险，没有文件依据的事情不敢干，更谈不上因地制宜大胆去闯。如何激发地方积极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防范化解区域风险全国化的治本之策。